



四川大學

中國俗文化

研究所叢書

漢魏六朝佛道文獻 語言論叢

俞理明 |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

中國俗文化

研究所叢書

俞理明 | 著

漢魏六朝佛道文獻
語言論叢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魏六朝佛道文獻語言論叢/俞理明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204 - 8

I. ①漢… II. ①俞… III. ①佛教—文獻—語言學—中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代—文集②道教—文獻—語言學—中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代—文集 IV. ①H109.2 - 53②B948 - 53③B958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09523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選題策劃 郭曉鴻
責任編輯 武興芳
責任校對 李 莉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22.75
插 頁 2
字 數 363 千字
定 價 86.00 元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 010 - 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總 序

這套叢書是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部分同仁的學術論文自選集。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成立於 1999 年 6 月，2000 年 9 月被批准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是“985 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的主要依託機構，也是“211 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所下設俗語言、俗文學、俗信仰、文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四個研究方向，涵蓋文學、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現有專、兼職研究人員 20 餘人。

多年來，所內研究人員已出版專著百餘種；研究所成立以來，也已先後出版“俗文化研究”、“宋代佛教文學研究”等叢書，但學者們在專著之外發表的論文則散見各處，不利於翻檢與參考。為此，我們決定出版此套叢書，以個人為單位，主要收集學者們著作之外已公開發表的單篇論文。入選者既有學界的領軍人物，亦不乏青年才俊；研究內容以中國俗文化為主，也旁及其他一些領域；方法上既注重文獻梳理，亦注重田野考察；行文或謹重嚴密，或議論生新；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我所的治學特色與學術實力。

希望這套叢書能得到廣大讀者和學界同仁的關注與批評！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自序

一九八三年，有幸進入四川大學漢語史專業，在向熹先生的指導下學習。先生專致於漢語史研究，視野開闊，仁厚寬容，積極支持學生投身研究實踐，探索創新。在先生的鼓勵和首肯下，我選擇了佛經材料作為漢語代詞研究的基本語料。這一選擇，首先與當時學界熱議的句末“為”有關。在漫讀語料時，無意間發現佛經中有不少句末“為”的用例，跟時賢討論的相類，但用語氣詞或動詞來解釋，都不妥當，更像一個代詞。同時，發現佛經中其他的一些代詞，比之外典用例更豐，變化更早，是一個可以深入拓展的話題。

當年川大的學術氣氛對這個選題十分有利。當時，項楚先生利用《大正藏》的材料研究敦煌文獻語言，取得突破性進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不在中國”的局面，令人振奮，成為我們這些新學的榜樣。同時，張永言先生大力倡導中古漢語研究，鼓勵後學投身其中。作為漢語史的一個部分，當時中古漢語研究非常薄弱，而佛經材料的時間跨度恰好覆蓋了中古時期，為這個選題提供了支撐。當然，障礙也是有的。首先，漢文佛經是翻譯的產物，這樣的材料適宜作漢語史的語料嗎？其次，部分早期佛經翻譯的時間和譯人存在不可靠因素，需要解決。第三，歷來以魏晉南北朝作為漢語史的中古時期，而佛經翻譯起於漢末，如何處理二者關係？頗費斟酌。因此，工作首先從文獻入手，借助於呂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以及歷代經錄，對漢魏六朝的佛經，按譯人和時代作了梳理，列出資料搜尋的基本順序和範圍。其次，為證明佛經材料作為漢語史語料的價值，需要與同時的漢語語料進行對比，即在查尋佛經文獻材料的同時，廣泛地翻閱同時代的漢語文獻，查找材料以相印證，避免祇用佛經材料“自說自話”。佛經翻譯最早出現在桓

靈之世，距漢末有五十年，通過對從東漢到隋朝佛經的考察，發現漢魏六朝時期漢譯佛經用語的性質基本一致，因此，不應該把漢末的佛經材料歸入上古，而與魏晉之後的材料作強行的分割。恰恰相反，應該尊重材料的一貫性，把漢語史的中古時期向前推到東漢後期，把這一時期的佛經作為中古漢語的基本語料。這樣，1986年春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漢魏六朝佛經代詞探新》。本書第一單元各篇文章，大多是在此基礎上陸續寫成的。

在為佛經材料搜集佐證的時候，也接觸了道教的《太平經》等文獻。當時漢語史研究者尚很少涉及道教文獻，立足於共時窮盡的原則，萌發了對道教文獻語言研究的念頭。1991年，承魏啟鵬先生介紹，在卿希泰、蔡叔先等先生的支持下，獲得了中華基金青年項目“道教典籍文獻語言研究”。這個課題，最初的計劃是從東漢的《太平經》以及《參同契》《老子想爾注》等文獻開始，對漢魏六朝道教文獻語料作一考察，再作展開。但道教文獻的梳理要比佛經更難，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最後，這方面的工作，止步於《太平經》的語言文字研究。此後，自己的關注點發生偏移，逐漸離開中古佛道文獻語言這塊寶地，關於道教文獻研究的一些想法，後來都由周作明具體落實，深入鑽研。《太平經》雖然篇幅有限，但課題進行中，前期的文獻研讀費時頗多，包括文字校正、句讀標點以及文本的核訂等，產生了許多想法，形成了本文集第二單元諸文，它們也是拙作《〈太平經〉正讀》的基礎。

在此過程中，也有一些兼涉佛道文獻語言研究的其他想法，包括以《太平經》為主幹語料討論語法的一些論文，匯集在本文集的第三單元。

回想起來，從當年進入川大在向熹先生指導下，同時聆聽張永言、趙振鐸、經本植、李崇智、張清源諸先生的教誨，一步一步走入漢語史的研究領域，這些年來，時或把先生們的教導付諸實踐，偶有寸進，感恩非淺。祇是自顧資質愚鈍，且時有懈怠，加之才疏學淺，未能盡窺先生治學之深奧，得其精華，闡揚光大，未免慚愧。

這次結集，大體是自己前二十年工作的回顧，也有少數的近年作品，是當年努力的餘留。文集中諸文主要根據論文的內容編排，沒有嚴格按照文章發表的順序。文章中原有的疏失，這次趁機作了補正。但學力所限，文集中或有其他錯謬，尚祈海內方家不吝賜正。

在此，感謝多年來各刊物編者的青目和提携，感謝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提供了出版機會，感謝責任編輯武興芳的認真負責，為本書出版做了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俞理明

2014 年末

目 錄

自序	(1)
----------	-------

上篇 漢譯佛經文獻語言和代詞稱謂詞研究

漢魏六朝佛經在漢語研究中的價值	(3)
從漢魏六朝佛經看代詞“他”的變化	(11)
漢魏六朝的疑問代詞“那”及其他	(15)
從佛經材料看中古漢語人己代詞的發展	(25)
漢語稱人代詞內部系統的歷史發展	(37)
從佛經材料看六朝時代的幾個三身稱謂詞	(48)
從早期佛經材料看古代漢語中的兩種疑問詞“為”	(57)
漢魏佛經裡的“那中”	(70)
《一切經音義》中“這”的訓解	(72)
“師”字二題	(79)
從“佛陀”及其異譯看佛教用語的社團差異	(87)
“比丘”和它的異譯	(108)
漢譯佛經用語研究的深入 ——讀朱慶之教授《論佛教對古代漢語詞匯發展演變的影響》	(116)

中篇 《太平經》文本研究

漢代道教典籍《太平經》文字校讀	(123)
《太平經》通用字求正	(140)
《太平經》中的形近字正誤	(149)
《太平經》文字勘定偶拾	(156)

《太平經》文字脫略現象淺析	(163)
《太平經》的語法分析和標點處理	(170)
《太平經》語言特點和標點問題	(187)
《太平經合校》校對補說	(198)
道教典籍《太平經》中的漢代字例和字義	(205)
《太平經》中的漢代熟語	(215)
《太平經》中的應歎提頓語	(222)
《太平經》中的“平”和“行” ——答連登崗教授	(236)

下篇 基於佛道文獻的詞匯語法研究

東漢佛道文獻詞匯研究的構想	(249)
從《太平經》看道教稱謂對佛教稱謂的影響	(261)
從《太平經》看漢代文獻中的“億” ——兼談古代漢語數詞中的外來現象	(267)
《太平經》中的“者”和現代漢語“的”的來源	(275)
從東漢以前的文獻看“者”介入定中之間的過程	(288)
《太平經》中非狀語地位的否定詞“不”	(297)
《太平經》中非狀語地位的否定詞“不”和反復問句 ——從《太平經》看漢語反復問句的形成	(303)
古代漢語“否”的詞性	(313)
從東漢文獻看漢代句末否定詞的詞性	(324)
《玄都律文》的用詞和《漢語大詞典》的釋義	(334)
論道教典籍語料在漢語詞匯歷史研究中的價值	(347)

上 篇

漢譯佛經文獻語言和
代詞稱謂詞研究

漢魏六朝佛經在漢語研究中的價值

漢代，佛教隨着中西交通傳入中國，隨之而來的是佛經翻譯事業的興起。現存材料證明，在桓靈之世就出現了一些著名的翻譯家，如安世高、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其後譯經者輩出，像東吳的支謙、西晉的竺法護等都翻譯了大量佛經，十分著名。東晉以後，翻譯大家更多，譯經的水準和規模也更大，許多經文都長達數十卷。歷來研究佛學的專家多肯定東晉以後的佛經，如方立天先生說：“直到道安的時候，我國佛教徒對印度佛學還是處在生吞活剝的牽強附會的階段，並沒有真正理解和領會。當時譯經雖多，但疑偽雜出，而且翻譯沒有一定規則，草率粗糙，結果往往或因拘泥於直譯而譯理未盡，義難通曉，或因注重意譯而失其本旨，義多曖昧，還有因原文疏脫而前後矛盾，義不連貫。”^① 這樣從佛學的角度認識佛經，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從語言研究的角度來看，漢魏六朝的譯經正因為“草率粗糙”而保存了許多對語言研究極有價值的材料，值得重視。

佛子譯經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了僧侶信士學道修行，二是為了擴大佛教影響，度化眾生。在佛教剛傳入漢地的時候，擴大影響是主要的任務。湯用彤先生說：“佛教在漢世，本視為道術之一種，其流行之教理行為，與當時中國黃老方技相通。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賈以及熱誠傳教之人，漸布中夏，流行民間。上流社會，偶因好黃老之術，兼及浮屠，如楚王英、明帝及桓帝皆是也。”^② 佛教最初流行於民間，作為宣傳品的佛經也自然傾向於通俗。漢代，漢語的言文已經分化，佛經由於它獨特的內容和通俗要求，使它不便因襲一般的書面用語來表達，這與宋元詞曲、話本小說等來

① 參見《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道安評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②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3頁。

源於民間的文學形式興起時大量採用當時口語的情形相似。

翻譯者的文化素養也使譯經傾向於採用通俗口語。當時譯經，多數是以西域僧人為主、漢人為輔進行的。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般舟三昧經記》說：

《般舟三昧經》，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朔佛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此四字疑衍）時傳言者月支菩薩支識，授與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受。

可以看出，當時譯經主要靠西域僧人口述、翻成漢語，然後由漢人筆錄。唐智昇《開元釋教錄》載東漢譯經僧人十二，曹魏、東吳各五，其中祇有嚴佛調一人是漢人。今傳佛經中，沒有嚴佛調主譯的篇目，祇有他和安玄合譯的《法鏡經》。《開元釋教錄》卷一說：

玄以光和四年辛酉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等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

在二十一位祖籍西域的譯經者中，祇有東吳的支謙和康僧會從小生長在漢地，受漢文化薰陶較深，另外的西域譯經者都不是在漢地長大的。如安世高“以桓帝建和二年，振錫來儀，屆於洛邑。少時習語，便大通華言，慨法化猶微，廣事宣譯”。^①大多數西域譯經者都是這樣，到了漢地，利用他們學會的漢語，把佛教作為一種新的方術介紹給漢人，翻譯一些他們自己比較熟悉的佛經。但是像安世高那樣“少時習語，便大通華言”，沒有什麼正規的教育，顯然是通過與漢人交往，在短期內掌握漢語的，這樣學會的漢語當然是俚俗口語。另一方面，佛教當時還不登大雅之堂，牟子《理惑論》說“俊士之所規，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參與譯經的應該是些下層知識份子，他們自然要近俗些。

佛經的翻譯，北方早期主要以洛陽為中心，其後由於戰亂等原因，北方譯經地點時有變動，但新的譯經地點也多是政治重鎮，語言上受當時以

① 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一。

洛陽話為基礎的雅言（民族共同語）影響較深。在南方，率先大量譯經的是在洛陽附近長大的支謙。支謙在洛陽受學，後因避亂到江南，他譯經的地點大約在建業、揚都（約今南京、揚州一帶）。後來在南方譯經的西域僧人，基本上也是從北方過來的，地點多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祇有比支謙略晚的康僧會情況比較特殊。康僧會自幼生長在交趾，學道出家以及譯經也都在南方，但他師承的是安世高所傳的小乘佛教，也曾與北方人有過密切的交往，他在《大安般守意經序》中說：“宿祚未沒，會見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通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余從之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因此，康僧會譯經用語與其他人譯經大體是相同的，少數地方比較特殊，可能有南方方言的影響。

西晉時出了個譯經大師竺法護，《開元釋教錄》卷二說：

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郡……（法護）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曉。自敦煌至長安，後到洛陽及江左，沿路傳譯，寫為晉文。起武帝太始二年丙戌至晉帝建興元年癸酉，出經一百七十五部。清信士聶承遠及子道真、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

竺法護一生主要在敦煌到洛陽一帶傳教譯經，在他的周圍一直聚集有一批信徒作為助手，其中聶承遠、聶道真父子“從武帝太康初至懷帝永嘉末，其間稟諮法護”^①，協助竺法護譯經前後約三十年，這樣，竺法護譯經一方面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參考，另一方面又有一個穩定的翻譯班子和長期翻譯經驗，使他的譯經在數量和品質上都達到了空前水準，佛經用語作為一種文學語言趨於成熟、定型了。

按傳統分法，所有佛典可以分為經藏、律藏、論藏三大類，合稱“三藏”。最早譯成漢文的是經藏中的一部分佛經，主要介紹一些基本的佛學理論，多採用問答形式，如安世高、支謙的譯經大都屬於此類。其中安世高的譯經文辭簡樸，毫無修飾，反映了草創時期譯經的簡單粗糙；支謙的譯文比較注意修飾，有頭有尾，有些地方還有聲有色，很有文采。律藏可

①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二。

分兩部分，一類是關於佛本人身世的傳說、故事和一些說教性的寓言等，稱作“本緣”，這一部分佛經文學性強，涉及的生活面廣，是佛經語言材料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類經典的翻譯，起於漢末，在整個六朝時期都疊出不衰，其中較早的如東漢曇果、康孟詳的《中本起經》，題為東吳支謙的《太子瑞應本起經》《菩薩本緣經》《撰集百緣經》，東吳康僧會《六度集經》，西晉竺法護《生經》以及稍後元魏吉迦夜、曇曜《雜寶藏經》，蕭齊求那毗地《百喻經》等，都包括了許多生動有趣的小故事，其中行文也因為內容廣博不像其他經文那麼單調。律藏中另一類是戒律，即為修行的僧人制定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修養等各方面的行為準則，包括僧尼的衣食住行以至七情六欲，涉及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為了說明制定戒律的理由，還穿插了許多比喻和舉例性的小故事，其中反映日常事物、行為的詞匯尤其豐富，也是很有價值的語言材料。戒律的翻譯，主要在晉宋之際，篇幅多很大，主要有苻秦竺佛念《鼻奈耶》十卷、姚秦鳩摩羅什等譯《十誦律》六十一卷，姚秦佛陀耶舍譯《四分律》六十卷，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劉宋佛陀什譯《五分律》三十卷。論藏的內容主要是後學僧人對佛理的闡發，多採用逐段逐句講解的方式，其中包括許多詞義解釋，這些解釋有許多是從宗教角度闡明佛理的微言大義，但也有不少簡單的詞義詮釋，可供研究。論藏諸經的翻譯，雖然東漢已見，但主要還是在南北朝之後，像梁、陳時期的真諦就翻譯了大量的論藏經文。

由於漢譯佛經反映了漢末以後四百餘年間漢語的實際情況，彌補了這一時期其他典籍中口語材料的不足，為我們研究漢語實際語言變化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對中古漢語研究有很大的價值，近年來，國內學者利用佛經材料作為佐證，對一些文獻中的疑難詞語進行了成功的訓釋。^①我們在閱讀佛經時也發現，有些一般典籍中不常見而歷來學者爭議較大的詞語，在佛經中不僅用例多，而且意義顯豁。《漢書·趙后傳》“今故告之，反怒為”一句中的“為”，許多學者認為是語助，而《三國志·魏書·臧洪傳》“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一句，許多辭書，如《辭源》（修訂本）都把“爾為”作為一個詞條，訓作“如此”，“為”也被看作語助，但用這個解

① 如獲1985年度青年語言學家一等獎的四川大學中文系項楚老師對敦煌變文詞義訓釋，獲1986年度青年語言學家二等獎的南京師大中文系吳金華對《三國志》詞義的訓釋，都利用了大量的佛經材料。

釋去讀《三國志·魏書·劉放傳》“問曰：‘燕王正爾為？’”一句就不通了，原來這些句末的“為”是“何為”的意思，“反怒為”是說“反怒何為”，“爾為”則是“如此何為”，這種“為”在佛經中很常見，如《六度集經》中的幾個例子：

問太子為乎？

斯怪甚大，吾用果為？

開士問曰：“爾以水為？”答曰：“給王女浴。”

爾不殺為乎？

天授余祚，今以子（指養子）為？

王曰：“龍等來為？”

佛時難值，經法難聞，爾還為乎？

女曰：“爾等將以吾為？”

句中“為”也有訓作“何為”的，也舉兩個東吳康僧會譯的《六度集經》中的例子：

時夫人言：“王為相棄，獨自得便，不念度我？”

王聞哀聲，下馬問曰：“爾為深山乎？”

佛經材料在研究漢語發展變化中也有很高的價值。比如代詞“他”在先秦指“別的”，後來可指“別人”，又指第三人稱，但“他”到底是怎樣完成這一變化過程的，學者之間分歧很大，佛經的用例可以提供一些有力的證據。“他”在先秦主要指物，也可指人，都可理解成“別的”，但下面一例就不同了：

王覺求諸妓女，而見坐彼道人之前。王性妒害，惡心內發。便問道人：“何故誘他妓女著此坐為？”（東漢康孟詳譯：《中本起經》）

“他妓女”不是“別的妓女”，而是“別人的妓女”，“他”在這裡祇能解作“別人”，成了一個人稱代詞。“他”表示“別人”指代對象本來

是不確定的，但有時也可以定指，如：

世間之人亦復如是。見他頭陀苦行山林曠野塚間樹下，修四意止及不淨觀，便強將來於其家中，種種供養，毀他善法，使道果不成。
(蕭齊求那毗地譯：《百喻經》)

“他頭陀”不是說“別的頭陀”或“別人的頭陀”，而是說“人家頭陀”，“他”就指“頭陀”，二者同位，到了下文就單用“他”來指“頭陀”了。“他”就是這樣，從不定指到定指，從意念上的定指到語言形式上的定指，常被用來指稱第三人稱，到了唐代，終於成了一個真正的第三人稱代詞，而“別人”一義反而被排擠了。

總之，對漢魏六朝佛經語言材料的研究是中古漢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漢語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一方面研究的進展，將有助於整個漢語史的研究。

還需要說明一點，就是佛經在流傳中有不少訛誤，特別是早期譯者、譯經中不可靠的地方更多，需要我們加以甄別，去偽存真。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利用前人的經錄，如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隋法經的《眾經目錄》、唐智昇的《開元釋教錄》等加以考訂，也可以根據今人在前人經錄的基礎上的研究成果，如呂澂先生《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等。從實際的情況來看，這些經錄，特別是較早的《出三藏記集》是比較可靠的。比如早期譯經大師安世高在六朝以後是一個被神化了的人物，他名下偽託、誤題的篇目特別多，呂澂先生根據經錄記載剔除了三十多部，剩下的二十二部經文在內容和行文風格上就很一致了。因此，利用佛經時須對今本佛經所題的譯者作一核訂工作，選擇可靠的經文，這是十分必要的。

(原載《四川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

《文匯報》1988年2月14日第四版刊出據本文編寫的文摘，題目為：《漢魏六朝佛經有助漢語研究》。內容如下。

俞理明在《四川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發表《漢魏六朝佛經在漢語